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流变

张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流变

张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五四”自由主义流变 / 张胜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6622 - 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自由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09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08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孔继萍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75
插 页 2
字 数 259 千字
定 价 5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自由主义	(1)
第一节 自由主义	(1)
第二节 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轨迹	(4)
第二章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8)
第一节 严复生平介绍	(8)
一 家庭背景	(8)
二 个人经历	(9)
三 思想发展历程	(10)
第二节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27)
一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27)
二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29)
第三节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作品介绍	(32)
一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的政论文介绍	(32)
二 严复翻译的外国作品介绍	(40)
第四节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45)
第五节 严复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	(50)
第六节 严复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困境和矛盾	(54)
第三章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59)
第一节 胡适生平介绍	(59)

一	家庭背景	(59)
二	个人经历	(60)
三	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	(67)
第二节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71)
一	胡适的性格	(71)
二	国内教育	(77)
三	留美经历	(81)
第三节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作品介绍	(83)
一	《易卜生主义》	(84)
二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88)
三	《自由主义》	(89)
四	《容忍与自由》	(92)
五	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文章	(95)
第四节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103)
一	健全的个人主义	(103)
二	宪政主义思想	(111)
三	容忍思想	(113)
四	渐进和平的改革思想	(115)
第五节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118)
一	通过法治保障健全的个人主义	(118)
二	民主宪政思想	(122)
三	个人主义的关怀	(123)
第六节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困境和矛盾	(130)
一	不彻底的个人主义	(130)
二	没有根基的自由主义	(132)
三	理想与现实脱节的自由主义	(134)
第四章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	(137)
第一节	殷海光的生平介绍	(137)
一	家庭背景	(138)
二	个人经历	(140)

三 生平 and 思想发展历程	(142)
第二节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144)
一 金岳霖的思想作为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144)
二 “三民主义”作为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145)
第三节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作品介绍	(147)
一 《中国文化的展望》	(148)
二 《自由主义的底蕴》	(156)
三 《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	(163)
四 《自由的伦理基础》	(172)
第四节 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189)
一 反对极权政治, 呼吁自由民主	(191)
二 提倡科学理性, 反对蒙昧专断	(193)
三 反对传统主义, 标尚士人精神	(196)
四 延续“五四”精神, 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	(200)
五 理知自由主义的构建	(202)
第五节 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深化和发展	(204)
一 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的深化	(204)
二 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	(207)
三 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	(210)
四 殷海光晚年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化	(216)
第六节 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困境和矛盾	(225)
一 殷海光早年自由主义思想的困境和矛盾	(225)
二 殷海光晚年自由主义思想的困境和矛盾	(229)
 第五章 结论	 (233)
 参考资料	 (238)
 后记	 (244)

第一章

中国自由主义

第一节 自由主义

应该承认，只有非历史的概念才能被赋予恰当的定义，而涉及社会政治哲学时，没有什么概念是没有歧义的，但自由主义是最充满歧义的概念之一，对自由主义给以恰当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① 因为“自由”一词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是西方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而我们所研究的中国自由主义更是从西方所引译、介绍和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在此回顾一下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理念。

从文化基因的角度来讲，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就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基因。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可以说是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史的代表之作，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政治观，而理性主义则一直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那时的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留基波、德谟克利特等人已开始探寻万物的本源以及变化与永恒的话题，这些思想都为自由主义所形成的思想普遍化提供了思想基础；罗马以及中世纪的历史发展也把法律、上

^① 关于自由主义充满歧义的原因，李强在其《自由主义》一书中分析有三个。一是自由主义的历史性，也就是自由主义在近代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历史过程中强调的重点不同，也就使自由主义具有不同的历史含义；二是研究者的不同带来对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同，根据自己的需要强调其不同的方面，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不同的自由主义画面；三是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运动或政党的旗帜。

帝的观念植入西方人的脑海之中。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思想理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则是近代的产物。这是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为自由主义提供了重大的历史发展契机和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给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自由主义的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以神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重新肯定了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崇尚人的理性，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和本体论的内核就是个人主义，从这个前提出发，自由主义对自由、宽容和个人权利的类似承诺才得以推演出来，所以说文艺复兴运动和随后的启蒙运动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宗教改革运动对自由主义的贡献显得更为重要。宗教改革首要的直接成果就是孕育了自由主义的宗教宽容精神，尽管宗教宽容精神并不起源于宗教改革运动；其次是宗教改革运动把人的地位抬高到了可以直接和上帝对话的地步。宗教改革运动宣传个人完全可以不必通过教会这个中介机构来和上帝取得联系，只要个人心中有上帝便直接可以和上帝对话，这在实质上就极大地提高了个人的地位。按照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观点，西方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存在着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超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把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①从布洛克的观点来看，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为自由主义宣扬的宗教宽容、个人至上的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方社会历史影响的日益加深，在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理论、有限政府理论和宗教宽容精神的思想。他认为，个人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这些权利，并且政府的建立仅仅是基于被统治者的一致同意，一旦政府不履行原先成立时所赋予它的职责或其行为违背了人们建立政府的初衷和目的

^① [英]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

时，人们就有权利利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政府并重新建立一个新政府。所以洛克被称为“自由主义的鼻祖”。在洛克那里，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政府建立的目的就被提出来了，政府的作用仅仅在于保护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政府承担的角色就是“守夜人”的角色。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到了19实际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重大的社会危机，贫富分化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加剧、安全卫生事件层出不穷、生产过剩、失业率增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时自由主义开始修正其理论意识形态，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提出，国家应该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国家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不再追求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格林认为积极的自由观首先是人们有做某事的实际力量或能力；其次，人们应该有能力同样有机会去做那些值得做的事情；最后，格林的积极自由观还蕴含着明确的平等主义因素，即所有人都有能力“充分实现自我”。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治家，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指出，新自由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它也不认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它相信财产、占有物，通过竞争达到生活的标准之上，它也相信资本主义广泛分布于整个社会之中，同时它还相信改革而不是暴力能够维持现存秩序和改进社会。

自由主义进入20世纪之后，其内部出现了诸多分歧和派别，如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等。20世纪前期自由主义受到了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冲击一直处于低谷时期，直到70年代自由主义出现了复兴，其标志是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的出版。在这本书里，罗尔斯将正义理念推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并复兴了康德式的思维研究路径，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理论，试图弥补功利主义的缺陷。罗尔斯接受了典型的自由主义本体论，按照他的目的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之美德，个人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位的，社会是一种由个人创造和同意的设施，设施的每一种都服务于个人的自己目标。社会是一个为了相互利益而合作的冒险机制，但是，为了以防“合作”这个词带给人的幻觉，罗尔斯又立即进行了补充，认为这种“合作”典型充满了冲突和对利益的认肯。纵观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以及他的批评者，罗尔斯实质上也接受了人类本

质上是自私的观点，然而人类为了支持更具限制性但是却更为安全的人类社会和政府的安排，人类就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放弃在自然状态下的那种虽然较为自由，但是却缺乏安全和自足的生活。这同样是赋予个人的自由权高于其他社会价值的优先性。诺奇克虽然对罗尔斯的正义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这本书里也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窠臼，仍然是把人权观念当作最小国家个人自主的理论核心，为美国人的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提供了正当化的证明，加强了国家是自由的大敌以及对私有权的干涉是对人权的攻击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探讨。

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自由、宽容、隐私、宪政、法治、民主、理性、进步、科学、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等这些价值都可以在以上学者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找到本源，他们虽然有所争论，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核心理念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核心目的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是残酷无情的、它对私有财产权的盲目信奉以及它对‘大众’甚至民主本身的典型布尔乔亚式恐惧都是自由主义见不得人的阴暗面和骷髅头。自由主义的特征是远比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所打算承认的还要复杂、混合和模糊；它的遗产比想象的更少对我们有清楚的利益。”^①

第二节 中国自由主义发展轨迹

“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年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

^① [英]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自由主义的兴衰》（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

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能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①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中国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这一阶段中国的思想动态和实践状况，也形象地说明了国人们为什么学习西方以及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时也道出了学习自由主义的目的和动机——作为一种救国的理论、思想武器来改造中国、富强中国。自由主义真正开始作为一种学理理论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阈和思阈是在19世纪末期，并且自由主义得以很快传播是因为维新变法运动为其提供了进入中国历史舞台的重要契机，严复是第一个开始将自由主义思想传译到中国的，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文章宣传变法的思想理论、动因以及目的，然而发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的，自由主义倡导的议会政治、有限政府、市场经济、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等理论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斗争中的思想武器。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一直是资产阶级在支持和倡导，而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非常弱小，以至于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经不起保守派的一次反击就彻底垮台了，结果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中国遭遇了失败。其后辛亥革命的到来又为自由主义思想指导建国提供了机会，然后自由主义理论又由于其自身的不足、弊端也没能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的政治走向仍然是与自由主义的预期和设计无缘。随之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又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机遇。

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第二次大发展机遇则是号称“中国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时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时，国人们已经不再单纯、不加区别地宣传自由主义的理论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自由主义的功利主义理论上面，在这个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同时登台亮相，相互争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艳，胡适在“五四”时期作为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大力宣传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并且通过其美国老师杜威来中国做演讲助威。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深受其老师杜威的影响，而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明显带有其美国本土的气息和传统，所以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美国社会中的民主观念紧密相连，在杜威那里，民主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主张个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民主参与。杜威的这种积极作为的自由主义思想非常合中国自由主义者当时的口味，因为这种思想正可以积极倡导改造国民性，批判传统的一切，这就导致杜威的中国学生胡适等人大力宣扬传播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很快“杜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教育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舶来品”的性质，决定了一旦中国传入了自由主义思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便把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与世界上的自由主义理论同步发展，在杜威、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大行其道之时，张东荪也在宣传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的社会主义，实质上英国费边社和基尔特的社会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变种，只是包含有较多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要素而已。张东荪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各方面的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太低，经济、社会文化较为落后，所以中国当时最紧要的问题不是急于实施社会主义，也不是对财富加以公平分配，不是采取马列主义的理论用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法来救国于危亡之中，而是应该学习英国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跨越国共两党的冲突和矛盾。由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特殊国情，一些知识分子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又对北洋军阀愤恨，同时也对共产党的政策表示不同意，所以张东荪的自由主义理论俘虏了一批知识分子。

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思想的重镇转移到了台湾。其中雷震与殷海光是代表人物，他们以《自由中国》这一杂志刊物为宣传阵地，继续宣传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同时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反自由、反民主的政策予以激烈的抨击。殷海光由于受到了金岳霖、罗素、波普、哈耶克等人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他与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产生了很多理论上的冲突，尤其是他与徐复观的争辩。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殷海光本人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哲学基础经验理论和科学主义

开始重新思考，1966年1月1日由文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就是殷海光长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反思的总结。殷海光本人对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历程以及问题结构非常熟悉，所以他经过分析、总结后指出，中国自由主义发展的伦理学基础最为薄弱，受到人们的重视最少。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方面，他向反理性主义、蒙昧主义、偏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另一方面，他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爱的积极价值，认为这些价值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这反映了殷海光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反映了他努力的方向。

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在国门被打开之后，国家被侵略之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寻求救国、强国方案的一种努力，所以中国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并不是自然生发出来的，也并不具有西方社会那样的历史、经济、社会机构和文化传统，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一种方略，故中国的自由主义实质上一开始就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印记，是一种要求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和个人发挥积极作用的自由主义，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所借鉴的新自由主义正如历史上的佛教以及其他文化、文明传入中国，都必然发生转变，都必然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改造，都必然染上中国特殊的文化品格。

第二章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第一节 严复生平介绍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乳名体乾，谱名传初。投考马尾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改名复，字几道，晚号癸廌老人，别署观我生室主人、辅自然斋主人、尊疑学者、癸廌堂主人等。严复作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人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

一 家庭背景

严复出生于名医世家，在当时算是一户中等人家。他的祖父曾经中举，在县里做过训导，但这个官职并未维持太久。后来靠行医乡里来维持一家生计。严复的祖父精通岐黄之术，也正是靠这门手艺去悬壶济世。

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也是继承父业，父祖两代为中医，设医寓于福州南台苍霞洲。严振先为人厚道，对于穷苦人家的急症求诊，他常常是不计报酬。但是严振先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赌，当时南台岛各乡人家有发生急症的，常常雇轿夤夜来请他，到他家找不着，只得将轿子抬到赌场。有时正遇他输得无法脱身之际，病家只好替他理清赌债，拥他上轿而去。但是在1868年6月，严振先因为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身亡。在严复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虽然不算富庶，却也算得上能维持温饱的小康之

家。但就在他 14 岁的那一年——1868 年，随着他父亲的去世，家道开始中落。父亲突然去世，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一家四口的生计，只能靠母亲做女工来维持。严复平生对幼年丧父的回忆，一直是饱含酸楚的。民国初年，他曾为周养庵（肇祥）的《篝灯纺织图》题了一首诗，诗的前半段是：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贖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骨，下养女儿大。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①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严复的家庭确实是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二 个人经历

严复于 1854 年（咸丰四年）1 月 8 日生，初名体乾，福州江船政学堂时，易名宗光，字又陵，后又字几道。他的父亲首先给他启蒙教育，7 岁时进私塾，9 岁回乡在胞叔厚甫私塾读书，11 岁再至省垣，师事黄宗彝（少岩）。1868 年春节，严复秉承父母之命与王家之女王氏结婚，同年父亲逝世，家贫无力再延师受教。

1871 年严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五年。时隔六年之后，1877 年 3 月严复赶赴英国学习，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 年 6 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其间，严复自己感觉前途一片黯淡，自己又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试图走科举之路进入正途，然而多次考试均未能如愿。十年之后，1891 年他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 年严复出任学堂会办之后，尽管后来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事与愿违，因与李鸿章多有不合，自己虽有其名而无其实，办事处处掣肘，思来想去退出海军界，另谋他途发展。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① 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88—389 页。

次年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所译述的《天演论》在《国闻报》上连续发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汪康年、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2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6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7岁。当时诸子均未在侧，仅次女华严随侍。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谆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已轻群重……等语。

严复逝世后，葬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区盖山镇阳岐村北鳌头山东麓。墓坐是花岗岩石结构，呈如意形，三层墓埕，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封土为三合土质，封土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这座墓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严复为归葬亡妻王氏，令长子严伯玉监造的。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严复病逝后也合葬于此墓。陈宝琛作为严复的好友为严复撰写了墓志铭，曰：“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絳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鼉跋陆变江。鸥犹阅世君非蒙，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

三 思想发展历程

（一）报考船政学堂

1868年对于严复来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他父亲逝世了，使整个家庭失去了生活依靠，他也再没有经济能力去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的道路。遭受丧父打击的严复为了摆脱困境，被迫报考了新办的福州船政

学堂，这一决定也改变了严复一生的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统治者逐渐认识到海上威胁的严重性。中国在见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开始意识到，中国只有制造出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才能与西方抗衡。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人物左宗棠和沈葆楨等人，在福州创办了造船厂。为了培养更多能够造船和驭船的人才，于是设立了“船政学堂”。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考入该学堂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3个月考试1次，如果成绩优等，还可得赏银十洋圆；5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政府中得到一份差事，而且还可以参照从外国聘请来的职工待遇标准，优给薪水。

船政学堂的这些优待条件，对于当时一些家境较好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民众还是更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从秀才、举人、进士，进而步入公卿行列。对于这些人来说，丰厚的家业给了他们支撑，在他们眼中，科举才是正途。而像船政学堂这类学习西方科技的学校大都是“洋务”，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一条路，他们也看不到这条路的前景。但对于像严复这样的家庭来讲，船政学堂的这些条件，却是很有吸引力的。当船政学堂在1868年冬天正式对外招生的时候，来报考的大都是福建和广东一带的贫苦家庭的子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带着光宗耀祖梦想的14岁的严复也是这些前来应考学生中的一员。

入学考试有笔试、口试和体检，学堂特别重视视力。笔试的考题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为题作文一篇。刚刚遭受丧父之痛的严复写了一篇感人的百字短文，碰巧接管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也蒙丧母之痛，严复的作文得到了其共鸣，揭榜时，严复位列第一。

当时的船政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重点。课程设置中虽然也有“《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文理”，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造船和驭船的相关科学技术为主。在这里，严复系统地学习了外语、几何、代数、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化学、光学、电学、电磁学、声学 and 热学等课程。这些都是之前的一切学校所学不到的，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新知识，与严复此前在私塾中所学的四书、五经等截然不同。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使得他对这些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努力也使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871年，严复时年19岁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由于终考的成绩为最